

作为历史、现实和方法的科幻文学

——“青·科幻”丛书序

□杨庆祥



中国文学现场，科幻文学以其眼界、思维、爆发力而备受关注，为展现其面貌，我们邀请青年评论家杨庆祥，主编“青·科幻”丛书，收录极具活力的青年科幻作家代表作，一人一册。丛书名之“青”取青年之意味，更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祝福。

历史性即现代性

在常识的意义上，科幻小说全称“科学幻想小说”，英文为Science Fiction。这一短语的重点到底落在何处，科学？幻想？还是小说？对普通读者来说，科幻小说是一种可供阅读和消遣，并能带来想象力快感的一种“读物”。即使公认的科幻小说的奠基者凡尔纳和威尔斯，也从未在严格的“文类”概念上对自己的写作进行归纳和总结。威尔斯——评论家将其1895年《时间机器》的出版认定为“科幻小说诞生元年”——称自己的小说为“Scientific Romance”（科学罗曼蒂克），这非常形象地表述了科幻小说的“现代性”：第一，它是科学的；第二，它是罗曼蒂克的，即虚构的、想象的甚至是感伤的。这些命名体现了科幻小说作为一种现代性文类本身的复杂性，凡尔纳的大部分作品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变异的“旅行小说”或者“冒险小说”。从主题和情节的角度来看，很多科幻小说同时也可以被视为“哥特小说”或者是“推理小说”，而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小说也一度被纳入到科幻小说的范畴里面，更不要说在目前的书写语境中，科幻与奇幻也越来越难以区别。

清科幻小说新论》中对晚清科幻小说有一个概略式的描述，其中重点论述了《新石头记》和《新中国未来记》。王德威注意到了两点：第一，贾宝玉误入的“文明境界”是一个高科技世界；第二，贾宝玉有一种面向未来的时间观念。“最令宝玉大开眼界的是文明境界的高科技发展。境内四级温度率有空调，机器人来往执役，‘电火’常燃机器运转，天有飞车，入地有隧道。”“晚清小说除了探索空间的无穷，以为中国现实困境打通一条出路外，对时间流变的可能，也不断提出方案。”王德威将晚清科幻小说纳入到现代性的谱系中讨论，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考察相较“五四”现实主义以外的另一种现代性起源。

“以科幻小说而言，‘五四’以后新文学运动的成就，就比不上晚清。别的不说，一味计较文学‘反映’人生、‘写实’至上的作者和读者，又怎能欣赏像贾宝玉坐潜水艇这样匪夷所思的怪谈？”但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基于现代工具理性所提供的空间观和时间观，这种时间观与空间观与此前不同的是，它指向的并不是一种宗教性或者神秘性的“未知之境”，而是指向一种理性的、世俗化的现代文明的“未来之境”。如果从文本的谱系来看，《红楼梦》遵循的是轮回的时间观念，这是古典和现代的，而当贾宝玉从那个时间的循环中跳出来，他进入的是一个新的时空，这是由工具理性所规划的时空，而这一时空的指向，是建设新的世界和新的国家，后者，又恰好是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所展现的社会图景。

现实性即政治性

如果将《新石头记》和《新中国未来记》视作中国科幻文学的起源性的文本，我们就可以发现有两个值得注意的侧面，第一是技术性面向，第二是社会性面向。也就是说，中国的科幻文学从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科学文学”，也不是简单的“幻想文学”。科学被赋予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而幻想，则直接表现为一种社会政治学的想象力。因此，应

该将“科幻文学”视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而非一个本质化的概念，也就是说，它的生成和形塑必须落实于具体的语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发现，科幻文学具有其强烈的现实性。研究者都已经注意到中国的科幻小说自晚清以来经历的几个发展阶段，分别是晚清时期、1950年代和1980年代，这三个阶段，恰好对应着中国自我认知的重构和自我形象的再确认。有学者将自晚清以降的科幻文学写作与主流文学写作做了一个“转向在外”和“转向在内”的区别：“中国文学在晚清出现了转向在外的热潮，到‘五四’之后逐渐向内转；它的世界关照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中得到恢复和扩大，又在后三十年中萎缩甚至失落。这种二分法基本上还是基于‘纯文学’的‘内外’之分，而忽视了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实践行为，科幻文学远远溢出了这种预设。也就是说，与其在内外上进行区分，莫如在‘技术性层面’和‘社会性层面’进行区分，如此，科幻文学的历史性张力会显得更加明显。”关于科幻文学写作在中国语境中的危机，我们必须承认在刘慈欣的《三体》出现之前，我们一直缺乏重量级的科幻文学作品，这不是技术性的危机，而是社会性的危机。也即是说，我们并不缺乏技术层面的想象力，我们所严重缺乏的是，对技术的一种社会性想象的深度和广度，这种缺乏又反过来制约了对技术层面的想象，这是中国的科幻文学长期停留在科普文学层面的深层次原因。

在这个意义上，以刘慈欣《三体》为代表的21世纪以来的中国科幻文学写作代表着一种综合性的高度。它的出现，既是以往全部科幻历史的后果，同时也是一种现实性的召唤。评论者从不同的角度意识到了这一点：“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科技的日新月异让我们身边出现了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3D打印、人工智能、大数据、可穿戴设备、虚拟现实、量子通信、基因编辑……尤其是中国享誉世界的‘新四大发明’：共享单车、高铁、网购和移动支

付，更是和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中国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站在了全球科技发展的前沿。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幻小说对未来的思考，对于人文、伦理与科学问题的关注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主流问题，这为科幻小说提供了新的历史平台。”

虽然刘慈欣一直对“技术”抱有乐观主义的态度，并坚持做一个“硬派”科幻作家。但是从《三体》的文本来看，它的经典性却并非完全在于其“技术”中心主义。毫无疑问，《三体》中的技术想象有非常“科学”的基础，但是，《三体》最激动人心的地方，却并非在这些“技术”本身，而是通过这些技术想象而展开的“思想实验”。我用“思想实验”这个词的意思是，这些“技术”想象不仅仅是科学的、工具的，同时也是历史的、哲学的。或者说一种说法，不仅仅是理性主义的，同时也是理性主义的美学化和悲剧化。也就是说，《三体》所代表的科幻文学的综合性并不在于它书写了一个包容宇宙的“时空”，这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表象，而很多人都在这里被迷惑了，而更在于它回到了一种最根本性的思想方法。这一思想方法是自“轴心时代”即奠定的，即以“道”“逻各斯”和“梵”作为思考的出发点，并在此基础上想象一个新的命运体。如果用现代性的话语系统来表示，就是以“政治性”为思考的出发点。政治性就是，不停地与固化的秩序和意识形态进行思想的交锋，并不惮于创造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和建构模式——无论是在想象的层面还是在实践的层面。

以科幻文学为方法

在讨论科幻文学作为方法之前，需要稍微了解下我们身处的历史语境。冷战终结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格局，也在思想和认识方式上将20世纪进行了鲜明的区隔。具体来说就是，因为某种功利主义的思考方法——从结果裁决成败——从而将苏东剧变这一类“特殊性”的历史事件理解成一种“普遍化”的观念危机，并导致了革命普遍的不信任和污名化。辩证地说，“具

体的革命”确实值得怀疑和反思，但是“抽象的革命”却不能因为“具体的革命”的失败而遭到放逐，因为对“抽象革命”的放弃，思想的惰性被重新体制化——在冷战之前漫长的20世纪的革命中，思想始终因为革命的张力而生机勃勃。正如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对本雅明的几点看法》一文中指出的，“体制一直都明白它的敌人就是观念和分析以及具有观念和分析的知识分子。于是，体制制定出各种方法来对付这个局面，最引人注目方法就是斥斥所谓的宏大理论或宏大叙事。”意识形态不再倡导任何意义上的宏大叙事，也就意味着在思想上不再鼓励一种总体性的思考，而总体性思考的缺失，直接的后果就是思想的碎片化和浅薄化——在某种意义上，这导致了“无思想的时代”。或者我们可以稍微迂回一点说，这是一个高度思想仿真的时代，因为精神急需思想，但是又无法提供思想，所以最后只能提供思想的复制品或者赝品。

与此同时，因为“冷战终结”导致的资本红利形成了新的经济模式。大垄断体和金融资本以隐形的方式对世界进行重新“殖民”。这一轮的殖民和利益瓜分借助了新的技术：远程控制、大数据管理、互联网物流以及虚拟的金融衍生交易。股票、期权、大宗货品，以及最近10年来在中国兴起的电商和虚拟支付。这一经济模式的直接后果是，它生成了一种“人人获利”的假象，而掩盖了更严重的剥削事实。事实是，大垄断体和大资本借助技术的“客观性”建构了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个人将自我无限小我化、虚拟化和符号化，获得一种象征性的可以被随时随地“支付”的身份，由此将世界理解成一种无差别化的存在。

当下文学写作的危机正是深深植根于这样的语境中——宏大叙事的瓦解、总体性的坍塌、资本和金融的操控以及个人的空心化——当下写作仅仅变成了一种写作（可以习得和教会的）而非一种“文学”或者“诗”。因为从最高

的要求来看，文学和诗歌不仅仅是一种技巧和修辞，更重要的是一种认知和精神化，也就是在本原性的意义上提供或然性——历史的或然性、社会的或然性和人的或然性。如果说存在着一种如让·贝西埃所谓的世界的问题性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世界的问题性。写作的小资产阶级化，这里面最典型的表征就是门罗式的文学的流行和卡夫卡式的文学被放大，前者类似于一种小清新的自我疗愈，后者对秩序的貌似反抗实则迎合被误读为一种现代主义的深刻，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深陷于此地此地的秩序而无法他者化，最后，提供的不过是绝望哲学和憎恨美学。刘东曾经委婉地指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太多怨恨的东西，现在看来，这一现代文学的“遗产”在当下不是被超越而是获得了其强化版。

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21世纪的中国科幻文学提供了一种方法论。这么说的意思是，在普遍的问题困境之中，不能将科幻文学视作一种简单的类型文学，而应该视作为一种“普遍的体裁”。正如小说曾经肩负了各种问题的索求而成为普遍的体裁一样，在当下的语境中，科幻文学因为其本身的“越界性”使其最有可能变成综合性的文本。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有多维的时空观。故事和人物的活动时空可以得到更自由地发展，而不是一活了之或者一死了之；第二，或然性的制度设计和社会规划。在这一点上，科幻文学不仅仅是问题式的揭露或者批判（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劣势），而是可以提供解决的方案；第三，思想实验。不仅仅以故事和人物，同时也直接以“思想实验”来展开叙述；第四，新人。在人类内部如何培养出新人？这是现代的根本性问题之一。在以往全部的叙述传统中，新人只能是“他”或者“她”，而在科幻作家刘宇昆的作品中，新人可以是“他”——一个既在人类之内又在人类之外的新主体；第五，为了表述这个新主体，需要一套另外的语言，这也是最近10年科幻文学的一个关注点，通过新的语言来形成新的思维，最后，完成自我的他者化。从而将无差别的世界重新“历史化”和“传奇化”，最终是“或然化”。

我记得早在2004年，一个朋友就向我推荐刘慈欣的《三体》第一部。我当时拒绝阅读，以对科幻文学的成见代替了对“新知”的接纳。我为此付出了近10年的时间代价，10年后我一口气读完《三体》，重燃了对科幻文学的热情。作为一个读者和批评家，我对科幻文学的解读和期待带有我自己的问题焦虑。我以为当下的人文话语遭遇到了失语的危险，而在我的目力所及之处，科幻文学最有可能填补这一失语之后的空白。我有时会怀疑我是否拔高了科幻文学的“功能”，但是当读到更多作家的作品，比如这套丛书中的六位作家：陈楸帆、宝树、夏笳、飞氲、张冉、江波，我对自己的判断更加自信。不管怎么说，“希望尘世的恐怖不是唯一的最后的选择”，也希望果然有一种形式和方向，让我们可以找到人类的正信。

《四部半》

（文 摘）

一个末世的故事

我妈年轻的时候对我爸说，就算全世界只剩下他一个男人，她也不会嫁给他。这句话深深伤了我的爸，他化悲愤为力量，发愤图强，终于成了一名空间常轨维修员，一个人守在几万英尺的高空，如愿以偿地远离人类，远离地球，远离我妈。

后来世界上只剩下我爸一个男人，我妈嫁给了他。

我爸在那间幽暗压抑的空间站和星星做伴的时候，在工作之余，全力以赴地增加对我妈的愤恨，发誓一辈子不再爱女人。后来我爸回到了地面上，娶了我妈，因为那时候世界上只有她一个女人了。

他们别无选择。

在不远的过去，人类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快要消亡了，因为这种盲目乐观，人们在灾难来临时毫无戒备。

失踪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经过统计，消失的人包括如下类型：

好好先生、泼皮无赖、英雄好汉、恶棍流氓、绝色美人、超级恐龙、世界巨富、街头乞丐……总之，只要有人地方就有人消失，对所有人均一视同仁，体现了超乎善恶的公平原则。

人类为之苦恼了那么多年的人口问题有望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天“被弄没了”。这个短语结构简单，表意清楚，恰到好处。有人说，是上帝在进行清理工作。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外星人因为某种企图在绑架人类，比如攫取劳动力。有些想象力丰富的作家认为，有些高级的文明正在把可爱的地球人接到更美好的异次元时空，去过一种更崇高的生活。当然，这种话因为太扯了，没人理会。

整个地球安静下来，大家停止了一切争斗，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地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决心要阻止这种卑劣的行径。一切资源都动用起来为此服务，全地球都组织起来。世界各地都涌现出一批异常活跃的文学家，书写出累计几千万卷的充满了末世情绪和终极人文关怀的作品。这些人大部分很快就被弄没了，所以留下来许多未完成的千古绝唱。哲学家们分秒必争，在不知道自己哪天就没影儿的恐慌下，迅速地建立了若干套新的理论体系。所有的哲学和神学都不再关心人是怎么来的，而是致力于阐释人是怎么没的。当然，最务实最可敬的还是要属科学家们，他们联合起仅存的千千万万劳动者，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建立起一套全球自服务生存系统（GSSS），以确保将来幸存活下来的人能够存活下去，把香火传宗接代发扬光大，以图人类文明的东山再起。

该项目完成的那一天，全球还剩下最后五十来个科学工作者，大家看着自己的杰作唏嘘不已感慨良多，直到此时人们才发现什么叫团结一心排除万难、五十个诸葛亮顶一百五十个臭皮匠，可惜这种感人的国际主义精神来得稍微晚了些，不然生活本可能更美好一些。

当晚，这些人中之杰决定彻夜不眠，非要看看哪个朋友会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

翌日晨，五十位人杰全部失踪。此事引起当时全体人民的悲愤，大家对这种蔑视人类尊严的做法感到无比愤慨，经过商议，决定发起最后的抗议。于是仅存的一万来人都奉献出自己的隐私，甘愿让遍布各地的GSSS的摄像头全天候地关照自己，让系统记录下每个人的一分一秒，就算某些人没影儿了，总会有人留下来看到录像。

非要看看人究竟是怎么没的！“死也要死个明白。”大家这么想。

于是，在某一时刻，具体是哪一刻不太好说，一万来个人一下子全被弄没了。

生活是多么的残酷，最后总让人屈服。等到世上只剩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时候，这场浩劫似乎停止了。至少他们都是正常死亡的，而不是被弄没了。

地球上还剩下的一对男女，他们要面临的，应该说比当年的亚当和夏娃面临的，容易一些，毕竟还有个了不起的GSSS让他们衣食无忧。这么看起来，人类文明一息尚存，若要断点续续也并非绝无可能。

由于失踪呈现随机分布的特征，这造成了许多麻烦，像人事管理这种领域，遭遇了尤其可怕的灾难：一条命令从构思到发布到最后正确执行，几乎没啥可能。这个问题非常有趣，有待以后研究，在当时它造成的不幸的事件之一是：由于管理混乱，我爸差点被遗忘在太空。要不是后来某个决策者在某个时候于某种场合因为某些原因意外地想起了某些事情然后发布了某条指令并且得到某种程度的正确执行，我爸必然将被即将灭亡的人

类同胞抛弃在几万英尺的寒冷空间里和星星做伴。当然，要是那样的话，没准儿对他是一种解脱。

总之，后来他回到地面了。

一出舱门，我爸就看见GSSS的那些自动机器——无人侦察机、无人采掘机、无人运输机、自动供热器、自动收割机、自动按摩机、自动汉堡包机以及诸如此类的玩意儿，在他身边若无其事地飞来飞去、不慌不忙地工作着。

没有鲜花和掌声，没有一个人在乎他。放眼望去，普天之下，四海之内，一幅安宁和谐的太平盛世模样。整个世界一点毛病都没有，只不过看不见一个人，那叫一个荒凉。

然后，我爸来到管理整个GSSS的巨型计算机前，颤抖着双唇问：“告诉我，我是最后一个吗？”

计算机飞速地扫描着整个地球，然后低沉地回答说不是，他还有一位伴侣。

我爸找到了我妈，和她结婚了。

尽管他们曾经用最恶毒的语言互相伤害，但世上仅仅剩下两个人的时候，他们意识到，彼此之间再也不可能分开。他们必须结合，这是一种义务和责任，也是一种灵魂深处的需要。

从那时候起，他们很少交谈，总是默默地对视，对所有事都能达成共识。他们生活在一起，这是上天的安排。

漫游。从尼亚加拉大瀑布到非洲沙漠，从金字塔到长城，从卢浮宫到帝国大厦，他们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在空旷的地球上闲逛。

他们坐着自动驾驶的飞机，越过高山和大海，迎着万丈光芒，在云层中孤零零地飞翔。

这场漫长的蜜月悠闲极了，也悲伤极了。他们白天总是手牵着手，夜晚也互相抱着入睡，一刻也不能离开对方，生怕一眼照顾不到，再也不能看到另外一个人影。他们只愿意同生共亡，坚决不愿一个人没影儿，丢下对方，面对无边的悲伤。

他们再没有别人可以依靠，彼此相依为命。

我妈生下我之后，得了产后忧郁症。有一天她觉得不再需要我爸，于是趁他睡着时松开了许多年来一直握在一起的手，起身离开了。她走到很远的地方，断了自己的动脉，静静躺下。

我爸找到了我妈，把她埋葬了。

从那时起，我爸变得很阴郁。他把我拉扯大，从来没有对我笑过，当然也并不凶。等我开始懂事，能够自己去学习的时候，他忽然一夜间衰老得不成样子。他死的时候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他一生都没有真的恨过我，他爱我。

如今他们安息了，留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有时候我会想，也许是上帝不忍心见到人世间的怨恨，所以暂时请所有无关的人退场，单单留下我爸和我妈，让他们学会好好相处。

（摘自《四部半》，飞氲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